

“二传手”之失： 对我国新闻编译失范现象的批判话语分析

常江 杨奇光

摘要 本文使用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对2014年发生的三个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的编译事故——中央电视台马航报道的错译、澎湃新闻对《经济学人》的“选择性翻译”以及新浪网对《外交家》杂志的误译——进行文本分析,尝试探索编译者在二次编码的过程中由于翻译失误而改变事件原有意义的机制,并阐明编译失范引发公众的对抗式解码的现象对于提升新闻编译专业水准、探索全行业操作规范的意义。

关键词 新闻编译;二次编码;批判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常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奇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15.03.003

一、引言

在国际新闻生产领域,新闻编译者往往被人们喻称为排球比赛中的“二传手”,负责接对方来球并进行第二次传球及组织进攻。优秀的排球“二传手”需要具备敏锐的判断力、迅速的反应力及较强的组织协作能力,身处国际新闻“战场”中的新闻编译者同样需要对外媒的稿件进行敏锐而迅速的判断和处理,并具有在完成外语翻译的基础上对外媒稿件进行编辑和组织安排的能力。

2014年是国际大事频发的一年,自然也是国内媒体编译实践极为丰富的一年。然而在这一年里,却发生了若干起较为重大的新闻编译“事故”,引发民众争论并最终成为社会舆论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如下三个案例:第一,3月,载有152名内地民众的MH370航班在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联,然而在未获知准确信息的情况下,中央电视台(简称央视)新闻频道的马航报道将“end”一词错误翻译为“飞机坠毁”导致部分乘客家属崩溃;第二,8月,著名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选择性翻译”《经济学人》杂志社论“*What China Wants*”再一次引发公众对新闻编译操作规范问题的讨论;第三,岁末,

新浪国际将澳门某学者发表在日本《外交家》杂志的一篇个人评论移花接木,编译为“美媒评选出的2014年中国五大外交成就”,再次引燃民众对于新闻编译专业性的质疑。

本文认为,编译失范行为意指编译后文本与原文本产生了较大事实性出入以及二次编码者在编译操作环节上的业务技术失误。尽管任何错误都有出现的可能,但对于重要国际新闻和社会议题的编译失范往往因涉及人群广、议题本身重要性显著等原因而在传播过程中被无限放大甚至引发国际政治事件。以2014年发生的三则编译“事件”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独特社会文化语境下对编译文本进行批判话语分析将有益于我们更加理性、客观地认识新闻编译这项新闻实践活动。

学者们在论述新闻编译(transediting)的含义时侧重强调编辑和翻译的构成以及经由编译所体现出的报道框架。Stetting认为,编译包括翻译(translate)和编辑(edit)两部分,编译是在讲求实效性的国际新闻编辑过程中演变出的一种策略,媒体的报道框架也通过编译体现出来。^[1]进一步说,编译活动中新闻记者的真正任务是新闻故事的制造,所以通常情况下,记者会将翻译后的文本或新闻故事片段融汇进他们自己的新闻叙事中从而制造出与原报道立场不尽相同的新文本故事。^[2]当然,在新闻编译的原则上,多数学者认为,编译文本应当忠实于原文本并能让读者群体顺利接受。

新闻编译的行为最终落实为一种对新闻事实的解释过程。语言间的转化方式与描述和解释外国文化语境的方式间有明显的关联性,解释行为本身也不仅仅关涉语言间的转化。^[3]然而,在实际中,翻译和编辑的地位并不平等。作为一种实践性并以目标读者为导向的新闻业务,翻译的地位常常受到挑战。特别是在电视国际新闻报道中,翻译被视为最后也最不重要的新闻生产环节。^[4]

霍尔提出的编码(encoding)理论为研究新闻编译的解释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霍尔看来,意识形态的力量为解释行为划定了边界并在众多可

能的解释选择中主推一种特定的解释含义。^[5]如果说原始外媒报道的解释过程是具有意识形态力量的一次编码,那么国内媒体的编译则是反映本国意识形态、体现话语权力的二次编码。编译具有目标读者导向性,二次编码的目的也正是通过语言的转化和文化的跨越将讯息编码为可被本国受众理解的新闻文本。

在新闻编译的文本研究领域,学者Bani在对意大利《国际米兰》的编译报道和编译过程进行研究后认为,在文化要素的框架下,文本编译策略倾向于以卸去读者阅读包袱为目标(主要通过删减、解释、概括等手段),二次编译的框架选择策略常表现为保留那些地域接近、内容简单,能够代表目标读者惯常认知的新闻内容,进而让编译内容适应并符合目标读者的认知和预期。^[6]也有学者着重研究新闻标题的编译问题,并讨论了由标题编译所反映出的话语转换,这种受媒体立场影响的转换使得新闻呈现的视角产生偏见。^[7]

现有以编译文本为目标对象的研究较多以某一个或某几个新闻媒体的编译报道为主要分析内容,这些文本的选取往往随机性较强,针对性较弱,难以较为直接的反映出新闻编译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尽管有学者就2014年中引发舆论关注的新闻编译失范“事件”发表过评论,但目前尚缺少从理论角度分析编译失范现象的论述,而这正是本项研究的总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批判话语分析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Fairclough提倡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包括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三个方面,^[8]批评性话语分析着眼于语言与社会文化结构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本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关系密切。话语文本自身能够印象出社会结构关系和文化差异,这种关系和差异又反过来影响了作为新闻编译者对文本的再现。

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 文本层面:研究编译中词汇的选择、文本

的结构方式、信息来源等。

2. 话语实践 :研究编译者是如何生产文本并对文本进行解释,编译失误的文本得到的读者怎样的反馈(消费)——从新闻文本到舆论事件的上升。

3. 社会文化实践 :我国具体的政治文化背景对编译失范的影响。

研究对象为2014年出现编译失范且引发民众争论并最终成为社会舆论“事件”的三个编译失范案例:央视马航事件新闻编译报道、澎湃新闻编译《经济学人》杂志、新浪国际误译外媒对中国五大外交成就的评论。

上述样本选择的标准主要是依据编译失范现象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强弱,不同于一般性的媒体编译文本的抽样选择,本研究所选择的三个样本均是在2014年引发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即选择那些公众关注度高、争议性较强的编译文本,这些编译事件或是引发了公众的竞相转载或是吸引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其社会影响力强于一般性抽样文本也更具代表性。

三、研究发现

(一)“二传手”的文本失范

1. 词汇翻译中的二次编码失误。作为新闻编译中文本叙事的最小单元,词汇是编译报道的基础,特别是在以强调事实性为主的新闻报道编译中,名词、动词的翻译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关系到新闻事实的基本呈现。当然词汇的翻译也应结合具体的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方面是帮助编译者首先理解清楚原报道中该词出现的语境,另一方面则是为语言文化背景的转化做铺垫。然而,央视在马航报道的编译中却犯了严重的词汇翻译错误,以下是对两个文本的具体分析。

3月8日凌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航MH370航班突然从雷达中消失。失联航班原定于早晨6点左右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班上载有239人,包括154名中国乘客。3月24日,纳吉布发布消息对MH370的下落进行表态,然而正是CCTV针对这一表态的翻译导致了包括部分失联乘客家属情绪崩溃的后果,原文本

内容如下:

(1a)PM NAJIB RAZAK'S PRESS STATEMENT ON MH370:

It is therefore with deep sadness and regret that I must inform you that, according to this new data, flight MH370 ended in the southern Indian Ocean. (From: Prime Minister's Office Malaysia 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er)

(1b) 马方宣布客机在南印度洋坠毁(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3月24日的编译字幕)

这一案例中最大分歧是对end一词的翻译,央视将end翻译为“坠毁”显然是不准确的。End作及物动词在《朗文当代英汉词典》中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完成、结束,了解,终止”,另一种是“自杀”的婉转说法,但没有任何一种含义与“坠毁”有关。“坠毁”一词究竟对应哪一个英文单词的编码,我们可以参照国际媒体以往空难事故的报道用词,如,英国《卫报》对亚航QZ8501航班的报道使用了crash off这样的表述;又如,BBC在报道马航MH17的报道同样使用了crash一词。上述例子中的新闻媒体基于事实信息的确定性而将事件编码为crash是妥当的,国内媒体将crash二次编码为“坠毁”则也是合理的操作。

反观MH370的报道,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用词“终结于”(end)是非常严谨的,结合总理办公室给出的新闻稿可以发现,纳吉布在宣布MH370“终结于”南印度洋之前首先说明了英国卫星数据公司Inmarsat和英国空难调查局AAIB(UK Air Accidents Investigation Branch)的调查结论——MH370是沿着南部走廊飞行的,它最后的位置在珀斯西的印度洋中部。可以推断出的是,end的表述应源于调查结论中的“最后位置”这一含义,但根本没有信息表明飞机“坠毁”。

分析看来,编译者之所以会将end译为“坠毁”是受end一词中文对应意“结束”的影响,中文是高语境文化的语言,“结束”一词含义颇丰,比如基本含义是指某一事件的停止,但也包括其

他引申含义,如“生命的结束”是指生命的死亡。基本可以认定,编译者的误翻是由于对end“结束”一词的过度推想,造成这样失误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编译者没有结合词汇所在文本的上下文和具体语境。

另一个错译的例子则完全是因为二次编码者的技术失误。在“坠毁说”引发激烈舆论反应的两天后,3月26日“澳大利亚总理发誓说”又被各大媒体竞相转载。原文内容和编译文本如下:

(2a) We owe it to MH370 families: PM

I think we owe it to the grieving families of the 239 people on board, we owe it to the anxious governments of all of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people on board that aircraft, we owe it in particular to the Malaysians who are our friends and partners in so many regional ways, we owe it to all of them to do whatever we reasonably can do to the bottom of this mystery.

(2b) 澳总理誓言解开飞机失联之谜

我们向家属宣誓,我们向焦急的世界宣示,澳大利亚将穷尽一切可能寻找飞机碎片,穷尽一切可能解开这个谜团。(新浪视频编译的澳总理发言视频字幕)

显而易见的是编译者将澳总理发言中的owe误翻为了vow(发誓),owe的本意是“欠……债”、“感激”、“归功于”、“怀有感情”,澳总理的发言使用了owe it to的表达方式,结合上下文可以将owe一词理解为对失联航班的关切、负责之意。出现这样的翻译与翻译者的业务能力有关,属于技术性失范事件。

2.文本结构的二次编码失范。新闻编译往往会对原文内容进行删减、组接进而改变原文结构,然而删减重组的表达效果产生了不同于原文的含义,这有可能造成逻辑链条的断裂和表意环节的紊乱,忽视整体文本结构的“盲人摸象”式选择性翻译是对目标读者的欺骗与劝服。澎湃新闻编译《经济学人》封面特写“*What China wants*”出现文本结构的编码失误,导致

编译后文本与原文本产生较大出入。

(3a) As China becomes, again,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it wants the respect it enjoyed in centuries past. But it does not know how to achieve or deserve it.

(3b) 当中国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它想要重获过去数百年里所享有的那份尊重。

编译者将原文中的后半段“但是中国不知道该如何获得或拥有这份尊重”完全略去,造成表意的较大出入。与之相似的例子还有:

(4a) Finessing this need for things to change yet stay the same would be a tricky task in any circumstances. It is made harder by the fact that China's Leninist leadership is already managing a hug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ange and stasis at home as it tries to keep its grip on a society which has transformed itself socially almost as fast as it has grown economically. And it is made more dangerous by the fact that China is steeped in a belligerent form of nationalism and ruled over by men who respond to every perceived threat and slight with disproportionate self-assertion.

(4b) 无论如何,一方面谋划着要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原状,实在是一项进退维谷的任务。中国领导层努力控制着一个经济、社会都高速发展的中国,他们已在设法解决国内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巨大矛盾,这使得任务更为困难。

编译者将4(a)中“*And it is made more dangerous ...*”后面的部分省去不译的主要原因是后半句的内容是对我国民族主义情绪和社会治理问题的消极指责和质疑。本部分的3、4两个例子均是编译中对原文结构的改变,这种对原文结构的二次编码所反映出的是意识形态对于话语表达的决定性。尽管事实与原文产生出入,但这也是我国新闻媒体在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自觉表现立场的惯例行为。

3.信息来源的二次编码失范。新闻编译需要向目标读者交代信息的来源,信息来源反应出的

是一次编码者的立场和态度并指示出信息来源国的社会文化信息,较为常见的信息来源是国际权威媒体,编译者编译具有权威性媒体的信息能够降低信息不准确性的风险。在实际编译活动中,国内媒体有时也会用“综合外电报道”的表述方式模糊信息来源,甚至将海外侨报的报道模糊化为“外媒报道”。

然而,2014年年末新浪国际的一篇报道却将信息来源完全张冠李戴。新浪国际的一篇题为《美媒评中国2014年5大外交成就》的编译报道经由微博账号“@微天下”发布,该报道在开头写到:

(5)对中国外交而言,2014年总体形势良好,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中国外交“大跨越的一年”。那么在外媒看来,中国外交在这一年有哪些跨越式的成就呢?美国《外交家》杂志评出了中国外交2014年的5大成就……

这篇报道的真实出处是日本《外交家》杂志,^[9]而非新浪国际所说的美媒,更严重的错误是,原文章体裁是一篇澳门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撰写的英文评论,5大外交成就是该学者自己总结的而不是媒体评选出的。

中美外交是国际政治领域中十分重要的议题,中美关系也是国内公众关注度较高的双边关系,“美媒评选”与“5大成就”这两个标签的组接极容易吸引读者。国内公众重视美国这个“他者”眼中的中国外交,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美国继续称霸的大国关系越来越表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背景下,公众习惯于听到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评论,而当看到“美媒评选出中国外交成就”这样的消息时会感到新奇。当然事实证明,这是编译者错误交代了信息来源造成了二次编码的失误,这就提醒读者要用理性的思维去看到报道不被错误蒙蔽。

(二)新闻编译与“观众”的话语实践

1.二次编码者凭借话语力量制造舆论。二次编码的过程是一种惊险的跳跃,编码者借助话语的权力能够制造出话题事件。本文主要分析的三个编译案例都成为一段时间内公众关注度较高的舆论事件,事实上,在从编译失范行为上升

为社会舆论事件的过程中是,作为“二传手”的新闻编译者通过自身话语权力发挥了影响舆论的作用。

上文提到了MH370失联后“澳大利亚总理发誓”的错误翻译,缺乏辨别力的国内媒体跟风转发,新浪微博甚至还为此发起了#为澳大利亚点赞#的话题讨论(现已删除),包括多家知名媒体在内的官微接力转发。吊诡的是,一次荒谬的错误翻译竟为一场社交媒体上传递正能量的称赞接力培植了正确的土壤。此外,“美媒评选中国5大外交成就”的错误编译也获得了大量转发,转发者中同样包括专业媒体的官微。

2.观众的对抗性解码。新闻编译尽管为人们推倒了语言间的藩篱,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也在通过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而为目标读者建构出不尽真实的外部景象。一如霍尔认为,电视涉及社会知识和社会形象的提供与选择建构,通过它我们了解“世界”和他人的“生活真实”,并想象性重建他们的和我们的生活,使之成为可理解的“整体世界”。^[10]另一方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读者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示出解放性力量和解构的本能,继而使其对新闻编译这一二次编码的过程进行对抗性解码成为可能。

以澎湃新闻编译事件为例,当《经济学人封面特稿:中国想要什么?》的编译稿件面世不久即有一个名为“五月花号”的微信公号发表题为《澎湃新闻的翻译可信吗?》的批评文章并在微信圈走红,批评指出,对于文中重要细节的遗漏,无论是“故意性失误”还是小编手抖,都是对于事实的歪曲与偏离,会影响读者的理解,澎湃的公信力也显然会因此大大下降。还有名为“新闻传播学研”的微信公号对澎湃新闻的编译进行了量化统计,结果显示,共有六处删减,删减字数总计204个,删减占原文比例为17.7%。马航新闻报道发出后也同样有学者发文直指编译中的各类错误,这些对抗性的解码批评尽管包含一些“掉书袋”的理论层面的指责,但对抗解码本身在帮助还原事实,促进信息有效传播做出了有益贡献。

(三) 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编译失范行为

在文本分析和话语实践的基础上,新闻编译的失范行为还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可分割。以社会文化实践的视角看待编译的失范会发现“立场”对二次编码行为的强大影响。学者Martin和White曾讨论了媒体立场是如何在消息来源的选择中体现出来的,他们把消息源之间细微差别的判别过程称为编辑者的“立场”,立场是从受既定编辑观念影响下形成的有效信源选择模式中反映出来的。^[11]

澎湃新闻编译《经济学人》就表现出了较强的立场性,文章删掉了时殷弘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所发表的言论,内容如下:

(6) Shi Yin hong, of Renmin University in Beijing, one of China's most eminent foreign-policy commentators, says that, five years ago, he was sure that China could rise peacefully, as it says it wants to. Now, he says, he is not so sure.

“和平崛起”(rise peacefully)是我国对外宣传的口径,但中国学者对此表达出了不确定性,这样的言论被二次编码者有选择性地“视而不见”。此外,我们也应看到,将这样的观点呈现在新闻报道中本身也反映出了《经济学人》的立场,这种立场同样与本国的民众心态、政治原则等社会文化背景相关。

二次编码过程中的立场具有迭代性,这是由于国外媒体记者基于自身立场在一次编码的过程中已经对消息源进行了选择与摒弃,完成了一次编码,而在编译过程中编译者受自身立场的影响又在已有立场上附加立场。新闻不仅是对现实的描绘,更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12]经过迭代立场后的二次编码使得新闻编译文本对现实的镜像更为模糊和具有倾向性。

四、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性联系逐渐加大导致整个世界扁平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层次经由媒介的镜像而不断延展,其中,国际新闻的报道尤其丰富了本国民众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新

闻编译作为一种聚焦国际新闻报道的业务实践,其主要任务是对外国媒体的一手报道进行翻译和编辑,在首发媒体对原始讯息完成一次编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编码,二次编码者可以等同于新闻编译者。由于新闻编译的目标读者对象是不同于首发媒体国的民众,因而,新闻编译成为了跨越不同文化语境的新闻实践,而这种文化间的危险跨越增加了信息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而经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我国新闻编译领域大量存在的失范现象首先反映出从业者自身业务能力有待提升,文本层面词汇翻译的低级错误仍为俯仰皆拾的情况。当然,基于时效性的需要,国际新闻编译中往往存在着赶时间的现象,在普遍紧迫的状态下,语言的差异和文化的壁垒往往不被编译者所重视,或仅得到笼统的调整,难有对表达习惯和用词句法的细致打磨。尽管全球化的浪潮使得包括文化冲突和语言障碍等在内的许多复杂问题变得愈发模糊,^[13]翻译行为的灵活性可以加强,但类似于end被误译为“坠毁”、owe被误译为vow这样的现象需要避免。

其次,编译失范引发了读者对抗式解码,继而使专业媒体的话语权力在去中心化的时代受到挑战,编译失范事故引发的舆论热议体现出我国新闻受众具备解构新闻编译行业“潜规则”的意识并呼唤专业性的提升。新闻报道固然能够培养人们的驯化思维,并使公众在潜意识中通过这种驯化思维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令新闻框架在强调特定价值和事实的过程中影响人们的态度和情感。^[14]然而,经由澎湃新闻的编译文本被公众解构这一事例可以看出,这种中国传统政治传播文化下的全部基于立场而罔顾专业性的选择性编译策略已经受到广泛质疑

第三,在社会文化实践背景下,新闻编译的过程和结果固然受到具有迭代性的媒体立场的干预,而提升专业主义的内生需求则要求新闻编译实践继续探索普遍性的行业规范。经由编译文本建构的现实镜像既包括他国社会的文化实

(转第45页)

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7]

参考文献

- [1]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8-58.
[2][3]列宁全集(第2版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37.

- [4]列宁全集(第2版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91.
[5]列宁全集(第2版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9-40.
[6]列宁全集(第2版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68.
[7]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6-97.

(接第18页)

践也反映着本国文化的价值判断,既是对特定立场的固化,也是从业者的建构社会事实的一种专业化表达策略。然而,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编者往往倾向于以风险最小化为原则进行自我审查,对报道内容选择性无视,以想象的“立场”压倒“专业”,导致国外媒体的报道框架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译入也往往取决于编者这个“二传手”的自我判断,几无具体化、标准化的全行业编译守则供编者进行参考。如何在保持特定立场的基础上努力设定整个编译行业的专业准则,是提升我国新闻编译水准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 [1]Stetting, K. (1989). Transediting: a new term for coping with the grey area between editing and translating. In G. Caie, et al. (Eds.), Proceedings from the fourth Nordic conference for English studies (pp. 371-382).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2]Orengo, A. (2005). Localising news: Translation and the “global-national” dichotomy.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5, 168-187.
[3]Beckerman, G. (2004, March-April). In their skin.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40-43.
[4]Van Doorslaer, L. (1997). Vertalenvoortelevisie. *Restricties en uitdagingen. Filter*, 4, 24-30.

[5]Hall, S. (1994). Reflections Upon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J. Cruz & J. Lewis (Eds.), *Reading, Viewing, Listening* (pp. 253-274). Boulder, CO: Westview.

[6]Bani, S. (2006). An analysis of press translation process. In: K. Conway & S. Bassnett (Eds.), *Translation in global news: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23 June 2006* (pp. 35-45).

[7]Hatim, B., & Mason, I. (1997).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8]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9]The Diplomat. (2014). The Top 5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Diplomacy in 2014. <http://thedi diplomat.com/2014/12/the-top-5-achievements-of-chinese-diplomacy-in-2014/>

[10]Hall, S. (1997). 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In J. Curran, M. Gurevitch, & J. Wo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1]Martin, J.R., & White, P.R.R.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 Appraisal in English*.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12]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3]Bielsa, E. (2005). Globalisation as translation: An approximation to the key but invisibl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isation (CSG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Warwick.

[14]Price, V., Tewksbury, D. & Powers, E. (1997), *Switching Trains of Thought: The Impact of News Frames on Readers' Cognitive Respons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4, 481-506.